

獄中生活

〔越〕 团 文 遂 著

龚新康 秦培根 译



狱中生活

〔越〕 团文遂著

龚新康 秦培根译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据西德科伦Kiepenheuer/Witsch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德文版译出

德文版书名：Der Vietnamesische Gulag

作者姓名（越南文）：Doan Van Toai

禁 獄 文 因 (獄)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獄 中 生 活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2千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贵州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 北·平二八武 定价：0.6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团文遂原任西贡（现称胡志明市）大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在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财政委员会工作。一九七五年，越南南方解放后不久，他被河内当局无辜逮捕，先后在陈兴道监狱和黎文悦监狱被关押两年多，一九七八年获释后，流亡法国，先后在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西德和瑞士等国举行记者招待会或报告会，揭露越南国内的真实情况。一九七九年秋，作者在一位法国朋友的帮助下将他的报告整理成本书出版。此后，各国纷纷翻译出版，各报刊杂志也竞相摘译介绍。

本书生动地揭露了河内当局对南方各界爱国人士，包括原临时革命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残酷迫害，也介绍了有关越南的“再教育营”和监狱的情况。本书对我们了解今日越南的国内真相，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对科学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在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偏见，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和鉴别。

本书引言及一至十二章由龚新康译出，十三至十八章由秦培根译出，龚新康校定。

目 录

- 引言 从“解放”中解放出来……………(1)
- 一 “你的名字叫遂吗?”……………(14)
- 二 三角洲的童年生活……………(29)
- 三 陈兴道监狱……………(42)
- 四 首次介入政治……………(53)
- 五 “今年春节非同昔比……”……………(69)
- 六 药物学院的代表……………(80)
- 七 学生斗争……………(94)
- 八 在阮文绍的监狱里……………(105)
- 九 土崩瓦解……………(113)
- 十 胡志明市的诞生……………(125)
- 十一 越南古拉格……………(138)
- 十二 “除了党的道路外没有其他道路”……………(150)
- 十三 革命政权的监狱……………(161)
- 十四 “想见你的家属吗?”……………(175)
- 十五 黎文悦监狱的菜汤……………(191)
- 十六 “最后声明”……………(210)
- 十七 集中营里的再教育……………(226)
- 十八 六十两黄金买一张签证……………(239)

引言 从“解放”中解放出来

深夜。我们在西贡郊外漆黑的树林中已交谈了多时。释仲法和尚紧紧抓住我的手向我告别（也许是永别）：“文遂，倘若我们在自由的国土上不能相会的话，我们一定会在另一世界的某地重逢。”

这是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释仲法是我在被监禁期间所结识的朋友，他脱去越南僧侣的袈裟，恢复原名阮友贤，辞别了他在文衡佛教大学的学生，别离故国，远走他乡。他把仅有的一点私产——他的书——赠给了一个从北方逃来避难的共产党作家，其中有他本人的著作，还有他翻译成越南文的，从尼采*到萨特**的欧洲伟大哲学家的著作，计二十余本。

阮友贤穿着越南农民的服装消失在黑夜之中，去加入被盎格鲁撒克逊报刊称作为boat people（船民）的行列。把这些在大海中漂流的绝望者称作为船民也许是较为恰当的，因为他们往往是在黑夜，带着家小离开他们可爱的祖国。他们身无分文，到处颠沛流离。人们只有在绝望中才会下决心去冒这样的风险。

我又回到现在叫胡志明市的西贡。我的运气比我的朋友

* 尼采（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译注

** 萨特（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作家。——译注

阮友贤好得多，我有一张去法国的飞机票，因此可以在被囚禁了二十八个月合法地离开我的国家。两天后，我到达巴黎。

到巴黎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我要向全世界揭露：“解放”三年来，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越南的集中营和监狱中，犯人竟达八十万之多！数字之大，以致大部分记者在报道时都显得很谨慎。这说明他们对这个数字是持怀疑态度的。越南政府当时曾被迫承认说，有五万名旧政权的军政官员在各“再教育营”中“改造自新”。附带说一下，三年前，人们是被叫去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再教育”……

然而，记者对于新政权犯人的“最后声明”却印象很深刻。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间，有四十八名犯人在这一声明上签了名，他们是当年的共产党员、解放阵线的战士或是反对西贡军事傀儡政府的知名人士。西方的左派们尽管对越南难民潮感到忧虑，但是直到一九七八年，他们还不敢向越南政府提出抗议。在他们的眼中，越南共产党是无往而不胜的英雄，它在三十年的战争中击败了法国，战胜了强大的美国，因此是反殖反帝斗争的象征。这些左派们被越南革命领导人的这种灵光照得眼花缭乱，因此无法看清他们的斯大林主义罪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左派们顽固地把所有到达泰国或马来西亚海岸的难民都看作是旧政权的最后支柱、富豪、恐惧革命的闪电般胜利的资产阶级或是美国人在西贡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沦陷之前未能及时带走的战争伙伴。

所以人们对难民们关于越南国内局势的介绍往往持怀疑态度。难民们谈到：人民遭受饥荒；大米的配给量在日益减

少；市场无肉供应；人民已失去自由；监狱和集中营都已超员；共产党干部在腐化堕落……但是人们对这样的话往往充耳不闻。有两件事情也许能打破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八年年底的沉默局面。十一月，旧货船“海洪”号开进了马六甲海峡，船上挤满了各种年龄和社会出身的难民，足有两千五百人之多。由于越南难民的急剧增加，马来西亚当局禁止该船靠岸，甚至拒绝补给生活必需品。于是“海洪”号又被赶入大海。世界新闻界对这一震撼全球的事件纷纷予以报道。越南人重演着古代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历史事件。“海洪”号事件一下子暴露了这场悲剧的规模。显然，难民潮只会上涨而不会低落。如今反对新政权的已不是当年为数不多的，旧政权时期的特权阶层，而恰恰是各阶层的人民。第二件令人震惊的事件是越南军队去年（一九七八年）对柬埔寨的入侵。当然，谁也不敢挺身去保卫这个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用流放和大规模屠杀来建立社会主义的波尔布特政权。然而，越南坦克肆无忌惮地侵占一个小国的行径，令人不安地想起了十年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多年来，河内政权对它的“兄弟民族”高棉人和老挝人反复表示过友好和不干涉。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使河内当局图穷而匕首见。

今天，老挝只不过是越南的一个被保护国而已，而柬埔寨（韩桑林政权）也甘愿充当它的被保护国。那么，越南政府自己是否独立呢？该政权崩溃的经济、没落的政治制度，也许还要持续多年的侵柬战争和越中边界上常年的戒备状态——这一切使得越南越来越依赖于莫斯科的援助，也迫使它越来越深地陷进苏联集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政权在世界上空前孤立。四年来，越南共产党几乎丧尽了越南人民在

三十年的斗争中所赢得的全部威望。

在法国，今天大部分知识分子要求以过去支持越南人民反帝和反独裁的同样原则来清算河内领导人。让-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这两位年迈的思想家拜访了法国总统并要求他采取有力措施帮助难民。

在美国，知识界的反应较迟钝，但是他们的行动却给人以更为深刻的印象。一九七九年六月，以琼·贝兹为首的人道委员会，在美国最大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开信”，信中说：“一百多年来，外国列强在贵国暴戾恣睢，横行霸道。然而，在当今新政权的统治之下，强暴犹存……”无数人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多数签名者曾为越南的和平战斗过，如诺曼·卡曾斯、艾伦·金斯伯格、欧文·霍罗威茨、I·F·斯通、赫伯特·戈尔德、詹姆斯·米切纳、威廉·斯蒂伦和莫里斯·韦斯特等。

以简·方达为首的最后一股亲越分子却唱起了反调。这个组织也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一封致琼·贝兹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您提出的唯一的论据是某个叫因文遂的人提供的，他和阮文绍政权和我们的中央情报局有联系，因此他可能是个间谍。”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当我一年来在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西德和瑞士揭露越南存在古拉格^{**}的事实真相以及当

^{*} 雷蒙·阿隆 (1905—)，法国社会学家和作家。——译注

^{**} “古拉格”一词，原是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的音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了描写苏联集中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后，“古拉格”一词就被广泛用作集中营或强劳营的代名词了。——译注

我发表本书时，我知道我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河内政府从一九七八年八月开始在舆论界掀起了一个反对我的运动。为此，他们首先推出当年西贡大学生联合会主席黄散闲（当时我是副主席，我们曾共同反对过傀儡政府）。

他们指责我盗窃了大学生联合会的“几百万皮阿斯特”^{*}。请读者仔细想一下，当时这个联合会无分文资金，我到哪里去盗窃这笔巨款？！此外还指责我是一个“花花公子”，说我破坏了大学生联合会的行动，企图组建一个反共的，当然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亚洲大学生联盟。更有甚者，他们还诬蔑我是旧政权的秘密警察，因此要对无数革命学生的“神秘失踪”负责。骗子、花花公子、叛徒、密探、诬告者、外国特务——罪名如山！这对一个在旧政权的监狱里蹲过好几个月，以后又领教过二十八个月牢狱生活（期间无人对我提出过任何起诉）的我来说，简直是荒唐之极！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我犯下所有这些“罪行”的时间，是在我揭露了越南当权者推行集中营政策之后。按照越南外交机构所散发的文件宣称，我“从一九七〇年起在学生运动中就已威信扫地”。既然当局对我早已不信任了，那么为什么在解放以后还公开推举我参加临时政府的财政委员会呢？既然当局在他们的文件中对我早有这么严厉的指责，那么他们又为什么直到后来才把我开除呢？当局手中掌握着我为旧政权效劳的罪证，当然也就不会允许我周游世界的。他们为了教化群众，杀一儆百而将我公开逮捕，这是毫不奇怪的。

* 是一种通用于印度支那地区的货币。——译注

我不想去指责今天对我提出起诉的那位黄散闲。过去他和我曾亲如兄弟，现在他虽然是国会议员，胡志明市青年组织的主席和共产党员，但他是不自由的。党已把我视为必须清除的敌人，因此他必须不择手段地攻击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必定会受人怀疑。对于我，如果需要“旁证材料”，他们可以编造，需要“证人”他们也一定会找到。

一年来，越南当局知道这本书将问世。他们甚至还知道本书前几章的内容。一九七八年九月，我的朋友米歇尔·瓦罗尔（本书译文的最后定稿人）在他的住所中丢失了本书前一百一十页文稿。本书一出版，那些支持越南的残余分子们（他们的人数在日益减少）立即被动员起来，围攻本书。

凡是了解斯大林主义方法的人（越南共产党没有发明其他方法）是不会感到突然的。不顾事实，诬陷捏造，用掌握在警察手中的“证人”炮制“证言”——这种方法当今已举世皆知，因此没有必要再对它们一一介绍了。在当今越南的黑暗社会中，人们没有自由，没有发言权。外国记者不能单独进行调查。在那里，当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讲得出来，也有办法让别人讲它的好话。

谁要是第一个揭露某个政权的可耻的阴暗面，而这个政权又被人认为是代表着全体人民和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的希望的话，那么他是最易受人伤害的。特别是当这个人，如象我，曾是革命的信仰者，就更是如此。右派们曾认为，如果共产党取得政权就预示着贫困和奴役。如今他们欣喜若狂地说：“这些我们早就对你们说过，但是你们还是帮了他们的忙！现在控诉这些，时间太晚了。”说得对，但是尽管如此，

人们难道应该沉默吗？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越南人在一九七五年四月所推翻的独裁政权的朋友。左派们，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传统观念：“如果你们强烈谴责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弱点，你们就加强了反动派的阵营。也就是说，你们出卖了自己的理想！”这种可怕的论调人们已听了半个世纪之久，特别是在苏联，几百万人不敢说一个不字，他们就是这种论调的牺牲品。

冷静的怀疑论者也是存在的。其中很多人是记者，他们的作用当然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他们说：“在两千万南越人中竟然有八十万囚犯！请想想，这么巨大的数字您一人说了算数吗？”是的，一年前确实只有我一人这样说，原因很简单。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在流落他乡的无数越南人中，只有极少数人有长期同新政权的集中营和监狱打过交道的经验。囚犯中，即所谓的“再教育营”的成员中，只有极少数人获释。凡是从古拉格出来的人实际上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国家的。其他合法、非法或是用黄金高价贿赂某个干部而逃出国境的人，则甘愿保持沉默，因为几乎所有这些人国内都有亲戚朋友或被囚禁的人，他们在受苦受难。如果他们揭露事实真相，那么他们在国内的亲人就会遭到迫害如逮捕、剥夺粮食供应证或者流放到被无耻地称为“新经济区”的地区。所谓的“新经济区”实际上是些不毛之地。数以十万计的城市居民将在那里慢慢地死去。

慢慢地死去，这就是政府全面同化南越的方法。四年来，所有旧政权的政治、军事和行政官员一直生活在“再教

育营”中。一九七五年四月，政府要求他们报名参加为期一月的“再教育营”。那些不愿意毫无保留地屈服于新政权的政治和思想的人，以及宗教界的领袖们，或已被囚禁，或正遭受被关押的恐吓。城乡居民一直处于严格的监视之下。儿童和青年在校外受到各种组织的控制：青年男子受军队控制，成年人在工作之余必须不停地参加各种集会。私生活已不存在了。人们甚至在家里也不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因为孩子们很可能无意中向他们的老师说出一些有危险的话来。

新越南是一座巨大的监狱，是一个古拉格。它与索尔仁尼琴所描述的苏联古拉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一样，也不是一下子就看清这些问题的。我也曾相信过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建设一个独立、中立和民主的南越；和北方保持友好关系；走自己的道路。我也曾相信过河内反复庄严许下的诺言：新政权将执行“重新和解与和睦”的政策；大多数意见会受到尊重；将不会改变（南方的）经济制度。

绝大多数南越人虽然对战争已感到厌腻，对旧政权也已感到厌恶，但是他们仍然拒绝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国家。然而，他们同意上述纲领。在知识分子当中，很多人梦想一个社会主义的“越南模式”。他们认为南越会自身社会主义化，甚至可以摆脱北越而实现自由化。这样一种理想的综合体，是在各种影响下产生的。“布拉格之春”的人们过早地想在苏联的鼻子底下建立这种综合体。人们认为，两个越南应该在这种综合体建立后再开始统一，到那时“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就将会实现。这种幻想在苏联、古巴、捷克斯洛伐克破灭之后，这里又出现了越南的乌托邦。

早在阮文绍政权被推翻后的第一次公众集会召开之际（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当时还滞留在西贡的西方记者就指出，解放阵线和临时政府的人员在新政府中将只占次要地位。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解放阵线和临时政府的干部逐渐被从河内来的党的干部所替代。在“解放”半年后，解放阵线就不起任何作用了。一九七六年春，北越共产党操纵的国会决定（当然是一致决定）南北统一。在西贡被攻克一周年纪念日前不久，它要求人民通过选举统一的越南国会来确认这个决议。在由此而改组的河内政府中，解放阵线只得到两、三个次要的领导职务。在国家的实际政府，即共产党政治局中，南越在其十七名委员中总共只有一个代表。当然，其他政党和非官方报纸的命运就更不用谈了。解放阵线关于建立一个“中立、独立和民主的”南越的纲领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在这段时间里，旧政权的所有军政官员（一百多万人）都接到邀请，向新当局报名参加“再教育学习班”。学习时间根据官职高低定为三天至一个月。这些在“解放”后一年中受到大规模诱捕的人们，除了地位低下的旧政权官员和没有参加战斗部队的普通士兵外，都没有走出学习班。同时，各监狱关押的“嫌疑分子”渐渐达到几千人。虽然旧政权的绝大部分当权者已去国外，但留下的毕竟还有一些。囚徒中大多数是那些企图“非法”^①逃离国家的“罪人”。他们是由于

^①越南政府至今一直没有解释清楚，离开它的国家为什么是“非法的”。这种说法与“人权公约”的第十三条款显然是矛盾的。该条款说：“任何人都有离开每个国家（包括他的祖国）以及返回自己祖国的权利。”——原注

“人民”的告发而在逃离途中被捕的。这个“人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简直看不透！被捕入狱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是当年反对阮文绍政权的人士，是解放阵线的积极分子和战士，甚至是当年的共产党员！谁不绝对赞成党的意见，谁就会受到怀疑，接着就挑出一些人监禁起来。

那些“自由的”越南公民很快就理解了，他们所盼来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所有人都被来自北方的党徒们看作是可疑分子。他们严密控制城市乡村，严密监视每幢房子和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百姓们被迫参加各种集会，翻来覆去地撰写“履历”，“自愿”参加各种儿童、青年、妇女和其他成人组织。这些组织的活动占据了他们的全部业余时间。他们有义务报告每次外出的情况，报告他们接待了什么人。这一切实际上妨碍了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生活的权利。配给供应也逐月压缩。一九七五年五月，每人每月配给供应九公斤大米，两年以后只有三公斤。每人每月计划供应的一磅肉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人们既没有见到肉也没有见到鱼。然而黑市却例外。人们在黑市上向新主人们出售“美伪时期的物品”。在一个通常出口大米、在和平时期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物资短缺的情况呢？农民们被迫按政府制定的价格赔本交售农产品，因此他们自己够吃后就不生产了。东欧的教训丝毫也没有被记取。

“可疑家庭”（指凡是有亲戚在狱中或在再教育营中的家庭，这涉及到几百万人）最终将被剥夺粮食供应证。他们把所有家产变卖一空后，最后只得去“新经济区”。建立这种区的目的显然是要把没有家业和职业的人赶出城市。如果这是指遣返在战争爆发前逃进城市流浪的农民的话，那么人们是

应该同意这样做的。但是“新经济区”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把数以十万计的不懂农业的城市居民送进不毛之地和不卫生的地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必将在那里慢慢地死去。这一措施的真正目的是要逐渐消灭那些被新政权怀疑为谋反的人们。

为了使大家了解越南的严酷革命，这里要提一下经济上强制推行的“社会主义化”。新政权的政策扼杀了法国统治时期残存的少数工业企业（包括庄园、银行和酿酒厂等）并妨碍了那些在美国人的保护下兴建的企业的复兴。可以推动工业发展的越南工厂今天全部由外行们领导。凡是被认为适合领导某家企业的人，首先要看有无党证。如今，内行的干部或在狱中，或流亡国外。无数能胜任搞尖端工业的越南人或在集中营或被安排在次要的工作岗位上。对熟悉商业和进出口业务华人（华裔越南人）的驱逐，更加剧了这场危机。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三日，越南驻法国大使武文充在一次谈话中承认，越南是“世界上二十个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是实话。在一九七五年战争结束时，国家还有振兴的希望。当然，多年来由美国下本的几十亿美元所产生的繁荣完全是虚假的，不健康的。这种繁荣带有通常的消费特点，完全不能反映国家的实力。解放后恢复简朴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越南人对此也表示理解和赞同。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的越南不能理智地利用美国人统治时期留下的某些可以加以利用的财产呢？如机器、公路、港口、机场，特别是无数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工人呢？在共产党的手中，这些资本不说被荡尽灭绝，至少可以说无利可收。经过四年为所欲

为的统治后，反对派是被消灭了，然而越南在各个领域内都面临着破产和失败的局面。越南共产党对这种后果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几十年来，越南共产党是在人民渴求独立的意愿中，在民族主义的思潮中崛起的。它懂得怎样去充分利用这些力量。它也正是利用这些力量才打败了法国人，逼迫美国人放弃了南越并最终铲除了西贡残存的没落势力。这一点令人敬佩。但胡志明及其同志们的决心和战士们的勇敢精神长期掩盖了越南共产党的真实意图，掩盖了其干部的狂妄、无知、独断独行的统治方式和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只要战争不停止，对它的神话也就不会停止。胜利后，党的阴暗面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共产党懂得如何去赢得战争——这是他们懂得的唯一的東西。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保卫和平和创立一个使越南人民可以接受的政权。

越南人的大规模外流，是迄今为止一个民族给它的领袖们的一记最响亮的耳光。甚至连在建造柏林墙前，几百万东德人逃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事件，也没有得到如此规模的揭露。那些人是从德国的一个部分逃到另一部分，而越南人则是背井离乡、流落他国，并往往是走向死亡。当他们驾着破旧的小船，既无燃料又无食品地驶向大海时，他们知道，他们能活着到达某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即使他们能到达某地并获准上岸，他们也将成年累月地被集中在难民营里，过着穷途潦倒的生活。在那里，他们无望地等待着得到去法国、美国或澳大利亚的签证，他们将在异国（如果他们能到这些国家去的话）成为无家可归的游子，为了生存而不得